

大家小书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李长之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李长之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 李长之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8. 6
(大家小书)

ISBN 978 - 7 - 200 - 13883 - 2

I. ①道… II. ①李… III. ①李白 (701 - 762) — 人
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5965 号

总 策 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高立志 邓雪梅

· 大家小书 ·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DAOJIAOTU DE SHIREN LI BAI JI QI TONGKU

李长之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94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3883 - 2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总 序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李白研究中的常青树

——谈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于天池 李 书

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于1940年8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距今已经过去了78年。在这期间，尽管研究李白的专著层出不穷，迄今已有数十种之多，而且，长之先生本人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应三联出版社之邀，还重写了一本《李白》的小册子，但是，纵观整个二十世纪的研究李白的学术出版史，仅有六万余字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始终独占鳌头，高踞榜首，一版再版，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李白诗歌必读参考书的首选。

一部学术著作经过长时间的删汰仍傲然卓立，一定有过人之处。那么，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它站在了当时学术的前沿，其研究李白的角度、方法使人耳目一新。

李长之写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时候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①他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熏陶，而且非常迅速地吸收了尼采、弗洛伊德等德国现代哲学家的营养，并用这些新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巨人。他强调要“深入到诗人世界中的吟味”，实际上就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人格精神的分析，不仅研究诗人写什么，怎样写，而且进一步探究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写。

表面上看，李长之“从道家的特征推阐李白的为人与创作特点”似乎并没有超出传统批评，但实际上他在李白的研究上展开了一个全新视野，他是以人的“生命流露”来研究李白的。他一则说：“说真的，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然而有一个不同，这就是他比我们喜、喜的厉害，悲、悲的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

①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出版于1940年8月，但实际动笔是在1936年底或1937年初。《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发表于1937年4月26日《北平晨报》。《李太白导论》（相当于《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之《导论》而略有不同），分两期发表于1937年5月31日、6月7日《北平晨报》。《李白：寂寞的人》（相当于《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之《李白：寂寞的超人》）发表于1939年2月《再生》。1939年11月19日写此书的序言。

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于种种压迫之余，所时时刻刻的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我们知道一般的疯子、狂人的价值，就更该知道一般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尤其该知道诗人李白的价值了。”再则说：“就根本处说，李白不能算矛盾，他有丰盛的生命力，他要执着于一切。但是就表现上说，就不能不算矛盾了，因为他要求得急切，便幻灭得迅速，结果我们看见他非常热衷，却又非常冷淡了。一会儿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一会儿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一会儿他以孔子自负：‘我志在删述’；一会儿他又最瞧不起孔子：‘凤歌笑孔丘’，矛盾多么大！”最后他说：“总之，他是太人间了，他的痛苦也便是人间的永久的痛苦！这痛苦是根深于生命力之中，为任何人所不能放过的。不过常人没有李白痛苦那样深，又因为李白也时时在和这种痛苦相抵抗之故（自然，李白是失败了的牺牲者），所以那常人的痛苦没到李白那样深的，却可以从李白某些抵抗的阶段中得到一点一滴的慰藉了！这就是一般人之喜欢李白处，虽然不一定意识到。”

李长之常说：“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①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他处处

^①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用“生命和生活”解读李白的行事和作品。他认为李白信仰道教的原因是“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收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生活上的满足是功名富贵，因此李白走入游侠，生命上的满足只有长生不老，因此李白走入神仙。”他解释李白诗歌题材何以雄大壮阔的原因是“因李白生命力充溢之故，他所取材的歌咏对象多半是雄大壮阔的：‘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端杀尽中山兔’（《草书歌行》），‘日出东方隅，似从地底来……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日出入行》），这种局势，可以说在中国四千年来的诗坛上少有第二人”。对于李白诗歌中的豪气和清真风格的形成，他同样认为是生命力充溢的缘故，他说“不错，清真是李白对于诗所要求的一个标准；不错，李白以这个标准而选择了谢朓。但李白自己的诗，却绝不以清真尽之。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说到根本处，我们还得归到老话，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毫无尘土气，他一空依傍；在那精神的深处，光芒四射而出，万物经这光芒的照耀，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

在李长之看来，李白诗歌修辞上的特点也源于李白旺盛的生命力。他指出李白诗里满满的“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这些极度的夸张的字眼，在别人是不常用的，这在一方面看，容易认为是像李白的一种口头禅似的了，在不经意之中，就总是这样夸大惯了罢了，然而另一方面看，却可以见出有他的性格所以使之然者在，正因为他内心里的要求是往往强烈的，所以他即使在不经意的时候也就如此流露而出了”。他又认为李白的“诗里常有‘忽然’的字样”“忽然的情调”，而这“正是代表他精神上潜藏的力量之大，这如同地下的火山似的，便随时可以喷出熔浆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形，正是为‘灵感’一词下了一个具体的注解。‘灵感’不是由外而来的，却是自内而生的，只是似乎不能自己加以操纵似的，要来，却是不期而来，所以用‘忽然’二字去描写那情景，便是再好也没有了。李白‘忽然’的情调特多，换言之，也就是他写诗的材料——灵感——的莅临也最频繁。诗有作的，有写的，作的勉强，写的自然。大家只知道李白的诗那么自然，冲口而出，真似乎妙手天成，却不知道这有一种根本的关系在，这就是他那充溢的生命力使然了。”

不能说李长之这种用“生命流露”的诠释全都正确，一无瑕滓，也不能说这种诠释前人就一点也没有触及，而且有时它

难以避免简率的诟病，但这种全新研究的视界无疑具有二十世纪的气息，像乍起的清新空气，吹拂了当时的李白研究学界。

文学界评论李白，向来有李杜对照的传统，“唐世李杜并称，未尝有所轩轻。惟元微之作李杜优劣之论，独重子美，于是后之人以为谈柄，不免于左右袒。至于今，论诗者言李，则必曰李杜，而后知为太白，若言杜，则不必连及李，而不知为子美者”^①，二十世纪初研究李白的专著也大都沿着这一路数，比如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1933年汪静之的《李杜研究》等，而且“即使其他几种仅标题为李白研究的著作，也把很多篇幅放在二人的比较研究上”^②。李长之突破了这一模式，由于他所写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原是“要合并起来写的关于中国五个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的一部大书的一部分，所以这小书中也时时以他们五个人作为对照”：

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Ideal)而奋斗的，
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Freiheit)而奋斗的，在杜

① 玄修《说李》，《同声》杂志1941年第一卷第九期、第11期。

② 周勋初《李白研究百年回眸》，《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④李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Menschlichkeit）而奋斗的，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Liebe）、为美（Schönheit）而奋斗的，那么，在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是生命和生活（Leben）。

儒教色彩曾经笼罩了陶潜，曾经遮掩了杜甫，但是却把李白几乎整个漏掉了。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李白比杜甫浅薄，这因为他们的精神形式实在不同故。在杜甫，深而广，所以能包容一切；在李白，浓而烈，所以能超越所有，他们都达到极致了，同是文艺的极峰，同是人类的光辉！静夜有静夜的美，白昼有白昼的美，在孔子和屈原，我们不能轩轻于其间了，在杜甫与李白，我们也不能有所抑扬。

从前人说陶潜诗篇篇有酒，其实李白或者更可以当得起这句话的。而且我觉得像李白在这里所说的“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酒倾愁不来”“酒酣心自开”，这种非饮酒的人不能有的体会，就是陶潜却也还没写过。

我们在这机会，又不妨拿李义山和李白作一个比较了，他们同是情感上极其发达的人物，但是李义山的力量永远向里边缩，永远像蚕一样，作茧自缚，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似的。李白却不然，他的力量永远往外面施放，所以一不如意，他就要毁灭一切了！同是不如意，在李义山只有悲哀，但是在李白却是加上烦躁，因为李白为那要求一切的生命力所激扰故。

可是相反的，李白却不善于写常情，他的许多寄内诗，都不佳。李白对于色情的观念，有时竟是鄙视的，例如他说：“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如世所讥”（《感兴》）；在这些地方，他和李商隐实在相反，李商隐对于爱情的观念是灵的，这不必说了；李商隐写到夫妇的情感处，则甚精彩；李商隐对于性爱，也从来不鄙视。

李白的痛苦又是没法解决的痛苦，这因为李白对于现世在骨子里是绝对肯定的。他不能像陶潜一样，否定一切，倘若否定一切，便可以归到“达观”了；他也不能像屈原的幻灭只是现世里理想的幻灭，但屈原却仍有一个理想没有幻灭，这就是他的理想人物彭咸，而且他也果如所愿的

追求到了。李白却不然，他没有理想，名，他看透了，不要；他要的只有富贵，可是富贵很容易证明不可靠；那么，他要神仙，便是神仙也还是恍惚。那么，怎么办呢？没法办！在这点上，他之需要酒，较陶潜尤为急切，那么就只有酒了，也就是只有勾销一切了。

无疑，这种多维度的比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李白的性情人格和他的诗作艺术特点非常有益处。假如我们把李杜两人的比较比作黑白反差的照片的话，那么将李白、屈原、陶潜、杜甫、李商隐五个诗人加以比较，那照片的色度和像素显然就丰富多了，宛如彩照，把李白活泼泼的影子在我们面前展现得更清晰。当然，以五个诗人相互参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敏锐的眼光、丰富的学识、融会贯通的笔力，这对于二十多岁，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李长之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我们看到，李长之是多么举重若轻地接受了这个挑战而应对裕如啊。

一部学术著作能够传之后世，当然一定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抢占制高点，在当时就造成轰动效应，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仅凭这点是不够的，因为那仅具备了学术史资格，随着理论和方法的普及，随着更多的学术著作的涌现，日月递嬗，

春秋代序，它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乃至被现实的人们所遗忘。一部学术著作要能够传之后世，它还必须在表述上具有独立鲜明的风格，具有文学艺术性，具有文学上的绝对的价值。这在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中尤其是这样。

李长之向来视论文的写作如同创作的，他说：“我写论文，有一个特点，就是视若创作。我一定等待灵感来时，好象一气可以把握整个文字的面貌——内容和形式——了时，才激动着写下来。”“写论文要像写创作，这是我的第一个要求。其次是，我把风格看得很重。所谓风格，就是这一篇东西，放在别人的作品中，可以立刻令人辨认出来。风格有消极积极两意义。消极是，它不同于流俗，积极是，它要显示它自己。风格要纯，要一贯。风格就是个性”（《关于写散文》见《梦雨集》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可以说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李长之这一观点的注脚。

据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创作缘起是这样的：在1936年底的时候，张荫麟想编一本中国通史，他希望约请李长之写杜甫的一章。李长之问他为什么不写李白，他说李白是浪漫派，不能写。李长之为了对抗他的观点，于是写了《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因此，《道教徒的诗

人李白及其痛苦》各章节陆续发表虽然延宕了三四年之久，但实际上是在1937年的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在其中，涌动着李长之对于诗人李白的热爱和冲动，涌动着他那浓烈的情感，因为在李长之内心的深处，他毋宁在李白和杜甫的轩輊中是更热爱李白的^①。

一般人知道李长之是学者，是浪漫派批评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浪漫诗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不仅表现的是一个批评家锐利的透视，也是诗人深入到另一个“诗人世界中的吟味”。《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语言流畅、飘逸，像散文诗一样具有抒情色彩，像“他这方面的感情实在太浓烈了，‘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可知他平日的挂念为何如了，这还不过和他的爱子们才别了一年而已！至于‘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谁复怜’，这便都是在别了他的爱子们三年以后写的了，那印象更多么具体，字句更多么给人刺激！没得到过家庭的温暖的诗人，但并没因此令他对于子女的慈爱有所欠缺。在一般目李白为狂人，为不近于人情的人，

^① 比如，在李长之的一生中，除去写有研究李白的单篇论文外，他还写有两本关于李白的专著，一本是《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本是《李白》，但对于杜甫，他没有专门的论著发表。

在这里要反省的罢，漂泊的李白，没有家的李白，狂歌度日的李白，他却是有着一颗多么与通常人逼近的，相通的心！”简直是在代李白抒情了。有时这种叙述在音韵、节奏上直造成一种低回咏叹的味道：“我们总括了看，李白的痛苦是一种超人的痛苦，因为要特别，要优待，结果便没有群，没有人，只有寂寞的哀感而已了；李白的痛苦也是一种永久的痛苦，因为他要求的是现世，而现实绝不会让人牢牢地把握，这种痛苦是何时代所不能脱却的，这种痛苦乃是应当先李白而存在，后李白而不灭的，正是李白所谓‘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愁是万古无已的了；同时李白的痛苦又是没法解决的痛苦，这因为李白对于现世在骨子里是绝对肯定的”。李长之在本书的前言中慨叹“外国很好的批评文字。那么亲切，有时像家常。——自然，在家常中，总有锐利的透视，耐人寻味的风趣”。他说“难道不能同样写中国的诗人吗？”我们看到，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显而易见在追求这种叙述的意境，而其追求是多么贴近成功了啊。

作为小册子，《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结构上非常完整，它以“生命和生活”为介入点，以李白的道家特征为推阐中心，以李白充溢的生命力和浪漫的热情为贯穿红线，旁涉李白的政治、思想、性情、文学的各个方面，勾画出诗人李